

海外藏中国玉器全集

玉器时代
THE JADE AGE

美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玉器
EARLY CHINESE JADES IN AMERICAN MUSEUMS

江伊莉 古方

BY ELIZABETH CHILDS-JOHNSON AND GU FANG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K-1365.0101)



玉器时代
THE JADE AGE

美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玉器
EARLY CHINESE JADES IN AMERICAN MUSEUMS

ISBN 978-7-03-026147-2

9 787030 261472 >

定价：498.00元

海外藏中国玉器全集

K876.84
J489

玉器时代

The Jade Age

美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玉器
Early Chinese Jades in American Museums

江伊莉 古 方

By Elizabeth Childs-Johnson and Gu Fang

K876.8

J489

内 容 简 介

本书首次全面披露了美国博物馆所藏中国早期玉器，以图为主，图文并茂，释文及研究内容视角独到，反映了玉器专业学者对美国所藏中国早期玉器的认识和研究现状。本书为读者了解海外藏中国玉器的来源、收藏及保存状况提供了准确资料，是国内外文物工作者、玉器研究者、爱好者和收藏家的必备工具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器时代：美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玉器 / 江伊莉，古方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海外藏中国玉器全集）

ISBN 978-7-03-026147-2

I . 玉 … II . ①江 … ②古 … III . 古玉器 - 研究 - 中国 IV . K87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8274号

责任编辑：闫向东 雷英/责任校对：张林

责任印制：赵德静/封面设计：辉煌前程

翻 译 Translated by

丁晓雷 Xiaolei Ding

古慈航 Cihang Gu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 政 编 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年12月第一版 开本：889×1194 1/16

200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8 1/4

印数：1-1600 字数：775 000

定 价：498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20世纪早期美国的中国古玉收藏家

江伊莉

我们这个研究的中心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三个主要玉器文化——公元前3500~前2000年间的红山、良渚和龙山文化——的玉器工艺。美国的许多博物馆都有这三个文化玉器的收藏；这些馆藏的建立者和捐赠者有：建立了美国境内最重要的玉器馆藏——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的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先生；在芝加哥艺术研究院建立了另外一個新石器时代玉器馆藏的桑尼辰（Edward Sonnenschein）先生夫妇；在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建立了一个也是很广泛的新石器时代玉器馆藏的温索浦（Grenville L. Winthrop）先生；在明尼阿波利斯艺术研究院建立了一个规模小但是藏品都是精心选择、光彩夺目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馆藏的皮尔斯白瑞（Alfred F. Pillsbury）先生；在布法罗科学博物馆和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建立了精美玉器馆藏的博物学家和生物化学家韩美林（Chauncy Hamlin）和德鲁蒙德（Wyman Drummond）先生，等等。在布拉克司吞（T. B. Blackstone）女士和其他人的协助下，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在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建立了一个面向人类学研究的玉器馆藏。这些玉器藏品通常是一个更大更多部分的亚洲或中国艺术收藏陈列的一部分，只有芝加哥艺术研究院的桑尼辰藏品完全是玉器。我们的问题是：在20世纪早期，是什么引起了这些中国早期玉器馆藏的形成？

初始阶段：19世纪90年代~20世纪10年代

美国各博物馆的中国玉器收藏多数是在20世纪的最初40年由个人资助或捐赠建立的。那时候，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的知识还很贫乏，甚至连那个时代能否加工玉器也不知道。实际上，20世纪早期关于古代玉器的主要著作宣称，中国没有史前时代，也没有新石器时代或者制造使用石器的时代。这部书——《玉器：中国考古学和宗教学研究（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12）》的作者，是著名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当时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东亚分部的主任。他写道：“根据现有的考古学知识和文献资料，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在其他文化区域被称为‘石器时代’的阶段。”¹¹当时，考古学在中国还没有诞生，所以劳费尔的这些论述不能算十分荒谬。后来大量的考古发现，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主动发掘获得的新发现，彻底地推翻了劳费尔的观点。

1912年，当劳费尔发表他的著作时，可供研究的发掘资料少得可怜。能够用来研究的主要是根据古史和古礼记载复原的玉器线图和对它们功用和性质的解释，例如玉器鉴赏家吴大澂在1889年完成的《古玉图考》。劳费尔对吴大澂的考证很欣赏，并且把它来作为自己分析中国玉器的跳板。在他最初几次中国之旅中，劳费尔自己也在西安和京津地区搜集中国玉器：先是1901~1904年间带领纽约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席福（Jacob H. Schiff）考察团在中国考察，然后是1908~1910年间在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资助下独自对西藏和中国内地进行的为期三年的“布拉克司吞考察”；其中后者的

收获较大。1923年他又赴中国。在他第二次考察获得的1 9000件器物中，包括1000多件玉器^[2]；其中没有一件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产品，尽管劳费尔认为它们是“考古资料”。

劳费尔是否把他搜集到的玉器鉴定为新石器时代产品并不重要，他的功绩在于，他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学科——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玉器。“考古学的角度”在这里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在他的文章中讨论的玉器没有一件是科学发掘出土的。现代考古学迟至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才进入中国。劳费尔把从中国搜集到的玉器设立了当时称为布拉克司吞女士藏品的馆藏，这些玉器是他研究的主要内容。劳费尔是出色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精通古代和现代汉语。他在德国的学业非常出色，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和在美国自然史博物馆民族学部任职（1904~1906年）时的业绩也很不俗^[3]。正如来德里（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在他的传记性回忆录里指出的那样，劳费尔对玉器有非常特殊的喜爱，“他特别引以为傲的是他的玉器收藏，他喜欢亲自给参观者讲解。他把这些玉器和他关于玉器的著作都看成他的主要贡献之一”^[4]。

20世纪初，中国早期玉器在西方被发展成一种收藏品和被寻求的物品，这应该主要归功于劳费尔。他不仅在学术上积极向西方受众介绍中国早期玉器，而且对中国玉器有着狂热的喜爱并且有能力为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的研究搜集中国文物，特别是玉器。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主要专注于学术项目并且发表了大量学术论著^[5]；在中国的考察给了他社会的和文化的熏陶。他在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以及他旅行所到的成都、天津、兰州、太原、苏州和杭州等地，都和文物掮客及收藏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1907~1934年，在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东亚分部担任主管馆员时，劳费尔负责为扩展馆藏购买相关文物。他对此显示了极大的热情，他的三次中国之行，为菲尔德带回了大约1万件中国文物^[6]。在菲尔德工作期间，劳费尔变成了不仅仅是汉学家和民族学家，还是一个渊博的中国通，一个收藏家和一个收费咨询专家^[7]。因为到了1912年他已经是美国知名的玉学专家，大批来自芝加哥——美国新的中国古玉研究领域的诞生地——附近或更远地区的新的中国玉器爱好者都要寻求他的帮助。他显然还私下里出售他从中国搜集的文物，尽管现存有关于此的记录并不详细^[8]。

20世纪的最初40年里，不仅劳费尔对中国玉器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企业家们资助的中国玉器收藏也大规模地建立起来。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古董从中国国内迅速向欧美特别是纽约这样大都市的美术馆和博物馆转移的时期。这种转移之所以成为可能，按照孔华润（Warren Cohen）的解释，是因为“中国1911年的革命以及此前此后的社会动荡，导致了中国过去主要古董收藏的解体，古代遗存的盗掘和大量文物杰作的流散——它们当中的多数都来到了美国”^[9]。劳费尔、古董商包尔（Abel W. Bahr）和美术史家萨尔莫尼（Alfred Salmony）都证实了这一情况——重要私人收藏的流散和古墓的被盗掘。比较有名的私人收藏家有端方、吴启周（天津）、吴大澂、卢芹斋（上海）和黄浚。中国史专家孔华润在他的著作《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 1992）》中指出，中国的艺术收藏与政治形势有关；在美国，东亚艺术品收藏的“黄金时代”在1893~1919年间——以1893年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开始收藏东亚艺术品为开始[可能起因于费内罗萨（Ernest Fenellosa）对日本艺术的爱好]，以1919年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查尔斯·弗利尔藏品的揭幕为结束^[10]。按照孔华润的观点，“黄金时代”收藏的主要是绘画和雕刻，多数来自日本和中国。杨晓能 在一部著作《中国现代考古学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Archaeology）》中，划分了4个阶段，最初的两个是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的初始阶段和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形成阶段；然后是1949~1976年的机构化（Institutionalization）阶段和1977年至今的成熟阶段^[11]。

孔华润的“黄金时代”与杨晓能的“初始阶段”恰好吻合；而“初始阶段”和“形成阶段”这两个术语也恰好可以用来描述这个时期美国的中国玉器收藏过程。这个阶段的玉器研究和玉器收藏也许可以用劳费尔学术生涯的两个阶段和他的两部著作来代表：第一是在1912年他对中国古玉的最初研究（《玉器：中国考古学和宗教学研究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第二是他的名为《现存于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的包尔中国古玉收藏 (Archaic Chinese Jades Collected in China by A. W. Bahr, Now in 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hicago. New York: privately printed by R.R. Donnelley & Sons Co. at the Lakeside Press, Chicago, in 1927 for A.W. Bahr)》的玉器目录。前者是对玉器收藏家吴大澂著作的“考古学”分析，后者是对古董商包尔（Abel William Bahr）于1926年从上海和纽约卖到芝加哥的中国玉器作了全面的鉴定和分析，并从美术史角度对玉器收藏作了总结。

劳费尔的著作《玉器：中国考古学和宗教学研究》主要研究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玉器，这些玉器是他于1907~1910年间在芝加哥布拉克司吞女士资助下从中国搜集的。劳费尔不是从美术史的角度而是从汉学的角度去研究吴大澂对中国古代玉器功能的考证；他的研究还参照了他自己收藏的玉器实例，解释了从早期历史时代到王朝时代末期中国人对玉器的信仰。他的研究使用了类型学的方法，而且是从中国传统本身去解释的。在第五章《宗教崇拜中的玉器——天神在玉器中的形象 (Jade in Religious Worship-the Jade Images of the Cosmic Deities)》中，当他介绍“琮”这种玉器时，首先引用了很长的一段《周礼》原文，然后引用了吴大澂著作中琮的线图，加上他从西安搜集的玉器的照片^[12]来详细说明。从西安得到的玉器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历史时代早期的西北龙山文化；也许劳费尔从西安得到的这些玉器就出自本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13]。

与劳费尔的玉器收藏和研究约略同时，查尔斯·弗利尔先生，一个出色的美学家和慈善家，也在建立一个玉器馆藏。弗利尔和劳费尔是好朋友，这从弗利尔邀请劳费尔为他在华盛顿史密森学会举办的第一个藏品展览（1912年4月15日~6月15日举行）撰写展品说明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展览是6年前就被批准了的。弗利尔后来的亚洲藏品将在史密森学会的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收藏。“弗利尔的朋友贝特霍尔德·劳费尔，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一位主任，当今最著名的玉器专家，为这（属于弗利尔的）175件展品撰写了说明”^[14]。

据罗覃（Thomas Lawton）介绍，弗利尔曾经去亚洲旅行过多次，其中两次中国之行——1907年和1910~1911年（最后一次）最为重要。罗覃写道：

弗利尔在1907年买到第一件中国玉器，四年后再次到中国时开始对中国玉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狂热地搜集、大量地购买中国玉器，许多是从北京、上海和开封的古董商那里收购的。他也从日本商人，包括在（纽约）第五大道上开有商号的山中定次郎（Yamanaka Sadajirō）那里买到一些^[15]。

弗利尔买到一些良渚和龙山文化的精美玉器，这些玉器在美国博物馆里至今都是非常出色的标准，但当时他只关注它们的艺术价值，并不知道它们的文化归属^[16]。

罗覃特别叙述了弗利尔从上海的古董商游筱溪手里购得的玉器，并且观察到，这个商人在那样早的时代（大约1916年）就提出弗利尔购买到的一件良渚玉器来自浙江的下溪（邻近上海）并且是公元前2000年的产品^[17]。这个年代判定和出土地点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发现的考古资料吻合，而这些考古资料证实这件器物的确出土于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良渚文化墓葬^[18]。罗覃认真讨论了除弗利尔获得的玉器（例如从一度任清朝陕西巡抚的端方旧藏中）外，还有从纽约一个古董商手里购得的一

件圭。这件两面带有纹章鸟和人兽面纹图案的玉器^[19]是1915年从纽约的黄中慧手里得到的^[20]。跟劳费尔一样，弗利尔在中国内外的古董商和收藏家当中也是声名远扬的，他们在美术史的学术界中也是如此。到了20世纪20年代，弗利尔已经不仅被看成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亚洲艺术品的顶尖收藏家之一，而且被看做是具有高度鉴赏和鉴定能力的专家，特别是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器，其中约30件代表性器物在本书中都有介绍^[21]。尽管弗利尔和劳费尔的个人职业生涯迥然不同，一个是带有无可挑剔的审美意趣和敏感性的成功的实业家兼收藏家，另一个是带有文化使命感的成功的学者，却都是20世纪初美国收藏中国古玉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初始阶段对这两项事业做出杰出贡献者的代表。

另外一个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玉器馆藏是在中国玉器收藏的初始阶段由德鲁蒙德（Isaac Wyman Drummond）博士（1855~1933年）建立的。关于他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于187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矿业学院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在Davoe & Reynolds公司从事油漆制造，去世前的职位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玉和琥珀研究助理。他和劳费尔无疑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劳费尔曾经“在一个夏天”整理了他收藏的大部分玉器，理论上是为了编写一个目录^[22]。尽管没有说明是哪年的夏天，但是根据同一次采访的记录，德鲁蒙德博士是通过“一个代理驻华大使舒恩（Wilhelm von Schoen）男爵获得了估计有50件以上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器。这位男爵与铁路建设公司关系密切，这个公司的苦力们在开山时发现了这些玉器”。根据1914年9月24日刊登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这位男爵当时是德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外交官，文章称其公开宣扬日本对美国的仇恨。这个报道和其他在英国和法国发表的新闻恰好出现于德国对法国宣战从而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显然，德鲁蒙德与国外的联系很密切通畅，而且至少他的一部分玉器是20世纪初通过在中国的关系获得的。他的藏品主要是西北地区龙山文化的玉器，也有一些是东南沿海地区良渚文化类型的产品^[23]。

形成阶段：20世纪20~40年代

中国玉器收藏的形成阶段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和美术史目录的大量编撰以及展览陈列的大量举办发生在几乎相同的时间；这些展览有卢芹斋在巴黎、上海和纽约办的，有包尔在上海和纽约办的。正如上文提到的，劳费尔在1927年发表他从包尔手里购得的玉器是20世纪20年代玉器收藏和发表的过程的标志。到了1914年，劳费尔在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获得终身职位，从那时起，他在芝加哥和美国中西部的玉器收藏界就成了一颗耀眼的明星。

1950年，即在皮尔斯白瑞（Alfred F. Pillsbury）去世后一年，按照他的遗嘱，他的收藏——虽然不多但是却极精美的176件玉器——被赠给了明尼阿波利斯艺术研究院（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尽管没有现存证据表明皮尔斯白瑞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收藏这些玉器时有劳费尔的指点，但是从劳费尔在这个年代里在玉器专业的声望来看，一定对他有很大的影响。皮尔斯白瑞只在1918年经海路去中国旅行了一次；从那以后，他和他妻子就在纽约的中国古董商卢芹斋的帮助下致力于搜集中国古代艺术品，主要是青铜器和玉器^[24]。在这段时间，很少有慷慨的企业家能像皮尔斯白瑞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收藏事业中。皮尔斯白瑞玉器收藏的亮点是标本的精心选择，特别是龙山文化的牙璋，正如在本书中收录的那些所表现的那样^[25]。稍晚时候，著名的银行家、收藏家和慈善家温索浦（Grenville L. Winthrop）也开始收藏玉器，并累积起了当时最大的玉器收藏之一、仅次于桑尼辰（Edward Sonnenschein）藏品的包括630件标本的馆藏。我们从这些藏品中选择了7件最出色的标本，包括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良渚和龙山文化的作品^[26]。温索浦虽然本人

去过中国，但是他的藏品却大部分是在古董商山中商会和卢芹斋的帮助下从美国境内获得的，这些古董商自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在纽约活动^[27]。温索浦把他的藏品赠送给了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温索浦藏玉中有两件在全美的博物馆里也算得上是最精美的中国玉器——红山文化的玉护臂^[28]和龙山文化的刻有精细人兽面纹的玉钺^[29]。劳费尔把包尔在1926年卖给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的玉器解释为他给美术史这一领域和这一时代的收藏嗜好的一个专门的贡献。似乎为了扮演像文艺复兴时期学识渊博的君子，人类学家出身的美术史家劳费尔虽然仍不愿意把包尔的任何玉器鉴定为新石器时代的产品，但是他愿意仿效欧洲和当时在美国也时兴的做法，就是把一个古董商的所有玉器藏品作为一个整体发表。在此之前这样做的有著名汉学家伯希和（M. Paul Pelliot），他给他的朋友、在到纽约之前在巴黎开有陈列馆的卢芹斋出版了题为《卢芹斋收藏的中国古玉（Jades Archaiques de Chine Appartenant à C. T. Loo, Paris: van Oest, 1925）》的藏玉目录。伯希和从美术史家的角度，尝试着借鉴形态风格和考古资料解决这些玉器的年代问题。这些玉器可能出自河南彰德府（今安阳）和洛阳的两座东周墓里，因为在巴黎没有卖掉，卢芹斋把这些玉器带到了芝加哥展览；又因为无法一起卖掉，这些玉器被带到伦敦后零散出售了^[30]。

1923年，乌娜·波普—韩奈茜（Una Pope-Hennessey）把她研究欧洲收藏的中国玉器著作《早期中国玉器（Early Chinese Jades）》献给劳费尔博士和一位铁路工程师吉斯拉（G. Gieseler）博士，“以表现英格兰研究界对他们在中国古玉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的敬意”^[31]。

包尔玉器中的多数新石器时代晚期标本的图片（曾发表在劳费尔图录中）收录在本书中^[32]，还有劳费尔在西安自己购买的良渚文化蛙形玉雕^[33]。在所有650件玉器中，146件有图片，其中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数都来自西北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存，少数来自东南沿海的良渚文化。在20世纪早期，包尔在收藏家中以中国艺术品的交易商知名；他的绘画收藏比古董商王己千（C. C. Wang）卖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绘画还要早^[34]。他似乎在1922年1月10日创造了一个纪录——出售一件玉塔（乾隆时代制）获得了1075美元的利润（见《纽约时报》）。在给劳费尔的玉学著作写的前言里，包尔告诉我们，他的收藏是在上海积累起来的，当时他的兄弟彼得住在四川北路165A，而他自己住在南京路24号^[35]。包尔也记录了“那个动乱的年代，中国的收藏家们（被迫）带着他们最喜爱的少数珍宝逃掉，我既不费力也不费钱就能搞到很稀罕的玉器”^[36]。包尔继续介绍道，他的多数藏品来自“著名的吴大澂的收藏”。他也提到从苏州一个名家顾鹤逸处收买玉器^[37]。

劳费尔可能对芝加哥的桑尼辰（Edward Sonnenschein）夫妇收藏中国玉器也有影响。桑尼辰夫妇是很出色的收藏家，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收藏了1300件左右的中国玉器，并且在1950年（爱德华·桑尼辰去世后一年、他的妻子去世后15年）赠送给了芝加哥艺术研究院。应当说主要是被劳费尔和他在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建立的玉器馆藏所激发，桑尼辰夫妇打算收集所有时代的中国玉器，但是很快，他们的兴趣集中在了早期的中国玉器上。1934年，他们的研究在一次赴远东的旅行后达到顶峰。在那时，他们的中国玉器收藏已经是西方世界规模最大的了^[38]。

从芝加哥艺术研究院藏品目录的款目里可以看到，桑尼辰夫妇在中国和西方都有中国玉器购入，例如从卢芹斋（纽约）、拉尔夫·查伊特（Ralph Chait, 纽约）、史宾克公司（Spink & Son, 伦敦）和卢芹斋（上海）。这些玉器中较珍贵的标本有石家河龙山文化风格的透雕玉饰^[39]，据藏品登记卡上由鲁伊斯·桑尼辰（Louise Sonnenschein）手书的购买记录，这件玉器购自卢芹斋^[40]。另一件精美的二里头时期带有后改痕迹的玉刀，是1954年用卡特·巴金汉姆购买基金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铁路工程师、后来成为古董商的欧文·卡尔贝克处收购的。

中国上古的玉文化和中国古玉的收藏热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给了美国艺术界一次深刻和永久性的冲击。萨尔莫尼 (Alfred Salmony) 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米尔斯学院 (Mills College) 和纽约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过亚洲艺术，在这一时期他被雇来为桑尼辰的玉器收藏编写目录，并于1952年完成。此前的1938年，萨尔莫尼写作的关于玉器的书籍是当时流行的风格：一堆配了说明的器物照片，介绍私人或公共收藏的艺术品。他的书《中国古代玉雕 (Carved Jade of Ancient China, London: Pisces Press)》起初是为了发表天津的收藏家吴启周的个人玉器收藏，这是1930年萨尔莫尼到中国旅行时访问过的。

萨尔莫尼跟许多在他之前的人一样，提到劳费尔的玉学著作体现了“西方（对于中国玉器的）爱好的决定性转折点”^[41]。萨尔莫尼有关从新石器时代到唐代的玉器论述读上去更像是玉器收藏家和古董商的人名录。他介绍的玉器来自以下这些人的收藏：包尔、卢芹斋、温索浦、桑尼辰、皮尔斯白瑞、弗利尔（这里我们仅列出在美国的收藏家名字）。他把20世纪30年代欧洲和美国最有名的玉器收藏家和商人的中国早期玉器编辑在一起发表，用形态学的资料来判定这些玉器的年代，我们这里选取了其中很多标本。

布法罗科学博物馆 (Buffalo Museum of Science) 的韩美林 (Chauncy Hamlin) 玉器收藏也是美国的中国玉器收藏形成时期的一个代表。正如琼·哈特曼 (Joan Hartman, 中国玉器掮客、纽约人阿兰·哈特曼Alan Hartman的妻子) 在她的开创性著作《布法罗科学博物馆的中国古玉 (Ancient Chinese Jades from the Buffalo Museum of Science, 1975)》所记录的，韩美林对玉器的理解和热忱都是独特的。一战期间，他在法国服役；战争结束后，他决定不回到法律界工作而是投身于公共服务事业，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把布法罗自然科学学会 (Buffalo Society of Natural Sciences) 和布法罗科学博物馆建成主要研究机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20世纪30年代他去中国旅行了两次，每次长达18个月^[42]。他学习中国的语言和习俗，同时着手在科学博物馆建立早期中国文物的馆藏。在赴中国的旅行中，他搜集到了超过100件玉器标本^[43]，其中13件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良渚和龙山文化^[44]。这是一个用高度的热情建立的非凡的玉器馆藏。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

在这个中国玉器收藏的形成阶段里，考古学起了重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中国考古学的出现和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了解，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突破性和划时代的发展——它们彻底改变了中国对文化的发现和理解。20世纪的中国文物收藏经常预示几年或者几十年后的考古发现。工程师、地质学家、铁路建设者、传教士和其他先驱者从国外涌入，与中国的同行们以各种方式合作；他们的活动不仅影响了考古学作为科学的一个分支和中国史前史研究的发展^[45]，也影响了中国文物收藏兴趣的变化。在“考古学”的初始阶段，科学家和收藏家的差别并不很明显。例如，有时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奠基人的安特生 (Johan Gunnar Andersson)，他从科学家变成考古学家和收藏家的历史众人皆知，也许这正与他的许多考古发现和研究受到中国、瑞典政府资助有关^[46]。安特生考察和“发掘”过的遗址多数属于中国北方的两个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即彩陶文化或称仰韶文化，及其在西北地区的后继者黑彩陶文化系统，也称陕北龙山文化，和在陕西、山西、甘肃和青海等省的更晚的齐家文化和陶寺文化^[47]。齐家、陶寺、西北龙山文化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玉器文化，它们都有标本陈列在美国的博物馆里^[48]。这些标本与安特生采集陈列在斯德哥尔摩的远东古物博物馆里的一样（该博物馆主要是他筹建的）。另外一个瑞典人，安特生的同事、铁路工程师欧文·卡尔贝克 (Orvar

Karlbeck)，是一个通过考古了解中国古代初始阶段的另外一种类型的先驱者，是中国古物这一收藏领域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他以中国政府聘用的铁路工程师的身份于1909年开始他在中国的生涯，而在20世纪30到40年代以替瑞典政府和欧洲收藏家服务的“寻宝者（treasure seeker）”的身份结束^[49]。卡尔贝克和安特生开始是受聘于瑞典政府为中国政府服务的地质学家和铁路工程师，后来却变成了“考古学家”和古物收藏家。

人类学和考古学方法的应用在20世纪30年代由李济——通常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和梁思永介绍进中国；他们都在20年代就学于哈佛大学。1928年，李济和梁思永在著名的晚商遗址河南安阳殷墟开始了正式的考古发掘^[50]，但是李济在中国的第一次正式发掘是1926年在山西的西阴村这个仰韶文化遗址进行的^[51]。

与玉器文化有关的考古发现并不是在华北和西北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出现的。在李济开始正式考古发掘后不久，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包括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日本考古学家在赤峰红山后进行了发掘，这个地方在现在的辽宁和内蒙古交界处^[52]。这一发掘命名了“红山文化”这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它集中分布在辽宁和内蒙古的辽河、小凌河、大凌河流域。20世纪30年代，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考古发掘也已经开始，包括山东城子崖等与海岱（山东）龙山文化及独特的玉器有关的遗址。这个遗址是由李济和他的同事吴金鼎主持发掘的，并由李济以遗址所在地命名为“龙山文化”。

同时，在南方，卫聚贤领导了浙江良渚镇新石器时代石质工具和玉器的发现^[53]；位于江苏、浙江和上海一带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是现在已知的三大玉器文化之一。

在四川等地还有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考古活动，主要是由一些新教传教士1910年在成都发起建立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和华西协和大学考古博物馆（Museum of Archaeology of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负责执行的。其中一个是由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主持的。他由浸礼会牧师转变成考古学家，从1932年到1948年担任华西协和大学考古、艺术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他在汉州（广汉）太平庄调查了一个大型遗址，这个遗址也出有典型的龙山文化类型的玉器^[54]，其中很多器类在美国的博物馆里也有标本收藏^[55]。

在中国考古学的试验阶段和初始阶段发现的红山、龙山和良渚文化遗址，是确立我们称为“玉器时代”或者确认这几个有意识地制作玉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基础。尽管当红山后、良渚镇和两城镇遗址被发现时它们的文化归属和年代尚未能了解，但到了100年后的21世纪，这三个遗址终于可以跟主要的玉器文化和美国博物馆里的那些精美玉器联系起来了。

结语：玉二十二家

除了上述的以外，在美国的博物馆里至少还有16个早期中国玉器的馆藏。它们多数是由个人捐赠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或更晚建立起来的，藏品经常来自展览或者古董商，例如上文提到的1950年从卢芹斋手里整体买入的。卢芹斋的一个更早的陈列和出售古董目录在1940年由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考古博物馆的馆长杰恩（Horace Jayne）编写并出版^[56]。本书中收录的3件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收藏的玉器^[57]实际上是1929年从包尔手中购入的^[58]。卢芹斋的第二个展览是1950年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诺顿艺术博物馆举办的^[59]。浏览诺顿这次展览的目录可以发现，展出的重要玉器多数是在20世纪初^[60]由收藏家买入，然后由主要的博物馆搜集的。展览中两件最精美的龙山和二里头的玉圭^[61]，一件是伊莱·里利夫妇（Eli Lilly）作为礼物赠送给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62]，一件是亨利·拉普汉姆（Henry G. Lapham）作为礼物赠送给檀香山艺术研究院的^[63]。这两件长度特殊的“斧”形玉圭在美国博物馆中的待遇是无与伦比的：伊莱·里利夫妇赠送给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

馆的那件圭被当作当代武术大师——例如成龙 (Jackie Chan) 或李连杰 (Jet Lee) ——的象征。

除了上述11个玉器馆藏外，还有另外11家以收藏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著名的博物馆，使我们知道的有中国早期玉器馆藏的博物馆达到22家：

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明尼阿波利斯艺术研究院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芝加哥艺术研究院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弗利尔美术馆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赛克勒美术馆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 (Harvard University Museum of Art)；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底特律艺术研究院 (The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弗吉尼亚诺福克市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及园林基金会 (Hermitage Foundation Museum & Gardens, Norfolk, Virginia)；
檀香山艺术研究院 (Honolulu Academy of Arts)；
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 (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
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布法罗科学博物馆 (Buffalo Museum of Science)
佛罗里达西棕榈滩诺顿艺术博物馆 (Norton Museum of Art, West Palm Beach, Florida)；
西雅图艺术博物馆 (Seattle Art Museum)；
圣路易艺术博物馆 (The Saint Louis Art Museum)；
迈阿密大学洛尔艺术博物馆 (Lowe Art Museum, University of Miami)；
密歇根大学艺术博物馆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useum of Art)；
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人类学博物馆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上述每一个博物馆都有精彩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标本；标本或者是独一无二的，或者带有独特的审美意趣。例如，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是美国仅有的几个（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收藏红山文化玉人像的博物馆之一^[64]。这件牛首人身玉坐像是在1953年收藏的，它具有红山文化玉器的一切造型和风格特点，这点被最近在内蒙古考古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玉人头像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玉牌饰所证实。

1960年密歇根大学艺术博物馆从哈佛大学著名的中国美术史专家罗越 (Max Loehr, 1903~1988) 教授处购买了约50件玉石器物，其中15件收入本书^[65]。这15件中，有两件最为重要：一件是被定为崧泽文化的钺^[66]，另一件是看上去不很引人注目的凤鸟纹残片^[67]，被鉴定为属于中国中南地区的石家河文化。这两件标本在美国的博物馆中都是罕见的，因为可确认为石家河文化和崧泽文化的玉器几乎没有。罗越无疑是1936~1945年间在北京的中德学会 (Sino-German Institute) 和清华大学任职任教时在北京购买到这些标本的。1951年，罗越到密歇根大学任教。与他卖给密歇根大学的标本相似的玉器，在近年纽约商人詹姆斯·莱利 (J. J. Lally) 的拍卖物品中可以见到^[68]。从罗越对他每件藏品的详细描述可以了解到，他经常涉足琉璃厂的各个古玩店，如黄浚 (伯川) 的通古斋、山中商会、敦华斋、陶古斋等^[69]。

总之，美国博物馆的中国早期玉器收藏主要是由五位既有经济实力又对中国早期玉器热情的个

人捐赠者发起建立的。贝特霍尔德·劳费尔则在美国创立了对中国古玉的收藏和研究，正如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的作品所展示的那样；他的工作也引起了其他投资者，如弗利尔、皮尔斯白瑞、桑尼辰和温索浦为美国其他博物馆建立中国玉器馆藏作出了贡献。

注 释

- [1] Laufer, Berthold 劳费尔 (1912).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Publication 154; Anthropological Series 10. Chicago. pp. 29, 54-5, 69.
- [2] Bronson, Bennet (2003). Berthold Laufer. Curators, Collections, and Contexts: Anthropology at the Field Museum, 1893-2002. In *Fieldiana. Anthropology*, New Series, No. 36.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hicago. p.121.
- [3] 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1937). Biographical memoir of Berthold Laufer, 1874-1934. I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U.S.) *Biographical Memoirs*, vol. XVIII-3rd memoir. Washingto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 44.
- [4] 同上 p. 45.
- [5] 同上 p. 57-68.
- [6] Bronson, Bennet (2003). Berthold Laufer. Curators, Collections, and Contexts: Anthropology at the Field Museum, 1893-2002. In *Fieldiana. Anthropology*, New Series, No. 36.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hicago. p.118.
- [7] 同上 pp.121-2.
- [8] 同上 pp.117-126.
- [9] Cohen, Warren I. (1992). *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37.
- [10] 同上 p. 35-74.
- [11] 同上 p. 25-45.
- [12] Laufer, Berthold (1912).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Publication 154; Anthropological Series 10. Chicago. 图版XV:1-3; 页120-53。
- [13] 参见本书图5-28~图5-31。
- [14] Lawton, Thomas and Linda Merrill (1993). *Freer: a Legacy of Art*. Washington, D.C.: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 212.
- [15] 同上 p. 205.
- [16] 同上 p. 205地图2。
- [17] 见本书图7-06。
- [18] 弗利尔美术馆档案, 编号No. F1915.87。
- [19] Lawton, Thomas and Linda Merrill (1993). *Freer: a Legacy of Art*. Washington, D.C.: Freer

-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 204.
- [20] 本书图3-19 (F1916.511)。
- [21] 如本书图2-04; 3-07、3-10、3-12、3-13、3-15至3-19、3-21; 4-02、4-11至4-14、4-18; 5-01、5-04至5-05、5-09、5-14、5-24; 6-10、6-14; 7-06; 8-05。
- [22]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档案, 1966年6月3日对Philip S. Herbert先生的采访记录。
- [23] 例如本书图3-22、4-03、5-29、8-01、9-19等。
- [24] Peterson, Harold et al (1977). Chinese Jades: Archaic and Modern, from 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Rutland, Vt. : C.E. Tuttle Co. 前言。
- [25] 见本书图11-03、11-06至11-08。
- [26] 见本书图2-13、2-14、3-11、5-15、9-06、9-13和9-24。
- [27] Mowry, Robert (1996). From Mementos to Masterpieces: Shaping the Asian Collections, Harvard's Art Museums: 100 Years of Collecting, NY: Harry N. Abrams, Inc.
- [28] 本书图2-14。
- [29] 本书图9-13。
- [30] Loo, C. T. Inc卢芹斋 (1950). An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chaic jades arranged for Norton Gallery of Art, West Palm Beach, Florida, January 20 to March 1, 1950. New York: Printed by the Gallery Press. (前言)
- [31] Pope-Hennessy, Una (1923). Early Chinese jades. London: E. Benn. (前言)
- [32] 本书图3-24、4-06、5-25、6-02、6-05、6-17、9-09、10-08、10-09、10-11、10-17、11-04。
- [33] 本书图3-01; Laufer, Berthold (1912).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Publication 154; Anthropological Series 10. Chicago. 图版XLII:3。
- [34] Siren, Osvald (1938). Early Chinese Paintings from A. W. Bahr Collection. London: The Chiswick Press, Ltd.; 亦见于Bahr, Abel Willem (1911). Old Chinese Porcelain and Works of Art in China, November 1908, Shanghai. London: Cassell and Company和Anderson Galleries, Inc (1926). Antique Chinese Potteries, Porcelains, Jades and Objects of Art: A Collection Formed by A.W. Bahr for Twenty-five Years a Resident of Shanghai, China. New York: The Anderson Galleries.
- [35] 根据村上惠 (Megumi Murakami), 菲尔德博物馆藏品目录档案。
- [36] Laufer, Berthold (1927). Archaic Chinese Jades Collected in China by A. W. Bahr Now in 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hicago. New York: privately printed for A. W. Bahr. p. 5.
- [37] 同上p. 6.
- [38] Salmony, Alfred (1952). Archaic Chinese Jades from the Edward and Louise B. Sonnenschein Collection. [Chicago]: [n. p.]. p.ix.
- [39] 本书图6-01。
- [40] 芝加哥艺术研究院目录卡片, 编号No. 1950.498, 由Lori Vandam提供信息。
- [41] Salmony, Alfred (1952). Archaic Chinese Jades from the Edward and Louise B. Sonnenschein Collection. [Chicago]: [n. p.]. p.1.
- [42] Hartman, Joan M. (1975). Ancient Chinese Jades from the Buffalo Museum of Science.

-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p. 7.
- [43] 同上。
- [44] 见本书图1-10、2-02、2-08、3-03、3-05、4-16、9-04、10-01、10-02、10-07、10-15、10-16和11-11。
- [45] 陈星灿 (1997).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46] Fiskesjö, Magnus and Chen Xingcan (2004). *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r Andersson, 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Monograph 15.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Östasiatiska museet.
- [47] 例如Bylin-Althin, Margit (1946). "Chi-chia-p'ing and Lo-han-t'ang,"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18: 383-498.
- [48] 见本书图8-01、8-03、8-06至8-08、9-18至9-21、11-11至11-17。
- [49] Karlbeck, Orvar (1957). *Treasure Seeker in China*, translated from the Swedish by Naomi Walford. London: The Cresset Press.
- [50] Li, Ji 李济 (1977). *Anya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51] 李济 (1927). 西阴村史前的遗存. 北京: 清华学校研究院。
- [52] 当时属于热河省, 滨田耕作 (1938). 赤峰紅山后: 滿洲國熱河省赤峰紅山后先史遺跡 (Hung-shan-hou, Chih-feng: Prehistoric sites at Hung-shan-hou, Chih-feng in the Province of Jehol, Manchukuo). 東京: 東亞考古學會.
- [53] 卫聚贤 (1937). 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 十年来的中国. 长沙: 商务印书馆: 295-309; 施昕更 (1938). 良渚: 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杭州: 浙江省教育厅.
- [54] 郑德坤 (1946). 四川古代文化史 (A history of ancient Szechwan). 成都: 华西大学博物馆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Museum), 第四章《广汉文化》; Graham, David C. 葛维汉 (1934).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s.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Research Society* 6: 114-31.
- [55] 见本书图11-11、11-17。
- [56] Jayne, Horace (1940). *Archaic Chinese Jades: Special Exhibition, February, 1940*. Philadelphia: The University Museum.
- [57] 本书图4-15、10-14、11-17。
- [58] 该馆馆藏记录。
- [59] Loo, C. T. Inc 卢芹斋 (1950). *An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chaic jades: arranged for the Norton Gallery of Art, West Palm Beach, Florida, January 20 to March 1, 1950*. New York: Printed by the Gallery Press.
- [60] 如Bahr's in 1926; Laufer, Berthold (1927). *Archaic Chinese Jades Collected in China by A. W. Bahr Now in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hicago*. New York: privately printed for A. W. Bahr.
- [61] Loo, C. T. Inc 卢芹斋 (1950). *An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chaic jades: arranged for Norton Gallery of Art, West Palm Beach, Florida, January 20 to March 1, 1950*. New York: Printed by the Gallery Press. 图版VI: 1, 5.
- [62] 编号60.62, 本书图7-07。
- [63] 编号1959 (2602.1), 本书图7-08。

- [64] 见本书图2-03。
- [65] 本书图1-01、1-02、1-05至1-07、6-04、9-02、9-05、9-11、9-14至9-17、9-20、9-21。
- [66] 编号1960.2.120, 见本书图9-02。
- [67] 编号1960.2.95, 见本书图6-04。
- [68] Lally, J.J. (1993). Chinese Archaic Jades and Bronzes from the Estate of Professor Max Loehr and Others. New York, NY: J.J. Lally and Co.
- [69] Lally, J.J. (1993). Chinese Archaic Jades and Bronzes from the Estate of Professor Max Loehr and Others. New York, NY: J.J.Lally and Co., 封二、封三及封底。

Americans Who Collected Ancient Chinese Jade during the Early 20 th Century

Elizabeth Childs-Johnson

The focus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late Neolithic jades of three primary jade-working cultures: Hongshan, Liangzhu and Longshan dating to ca.3500-2000 BCE. Many museum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representative collections of these Late Neolithic jade types. Names of benefactors in connection with jade collections include Charles Lang Freer who created the most significant late Neolithic jade collection currently available in the U.S at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in Washington, D.C. Mr. and Mrs. Edward Sonnenschein founded another extensive and rare late Neolithic jade collection in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the largest in the states, and Mr. Grenville L. Winthrop formed what is also an extensive jade collection now in the Harvard University Museum of Art. Mr. Alfred F. Pillsbury collected what is a stunning yet smaller number of Late Neolithic jades for 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 Naturalists and biochemists, Chauncy Hamlin and Wyman Drummond formed distinguished collections at the Buffalo Museum of Science and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respectively. With the support of a Mrs. T.B. Blackstone and others, curator Berthold Laufer helped create an anthropologically oriented collection at 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Chicago. The question poses itself: what prompted the formation of these substantial early Chinese jade collections and a dozen others in the U.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bulk of Late Neolithic jades in museums are either part of larger Asian or Chinese art collection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Sonnenschein collection in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which is entirely jade.

Initiation Period 1890's-1910's

Most early Chinese jade collections in American museums were formed in the first four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 by donations of private individuals. Yet, at this time little was known about Neolithic China nor that jade could be worked as early as the Stone Age. The major publication on ancient jad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fact claimed that China had no prehistory, no Neolithic nor age in which stone tools were made.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titled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12) was the eminent anthropologist and ethnologist, Berthold Laufer, then Assistant Curator of the East Asiatic Division at 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Chicago. He wrote "as far as the present state of our archaeological knowledge and the literary records point out, the Chinese have never passed through an epoch which for other culture-regions has been designated as a stone age." (p.29; also see pp. 54-55, 69). Since archaeology had not yet been born in China these assessments of Laufer's are not totally out of line. The plethora of new archaeological data uncovered from primarily excavations of the 1980's through 2009 dramatically and irrevocably refute Laufer's view.

In 1912, when Laufer published his findings little excavated data was available for scholarly scrutiny. What was available were numerous line drawings of jade types with explanations of their functions and properties based on data gleaned from classical ritual texts, as explained by the jade connoisseur, Wu Dacheng in 1889 in the work titled *Guyu tukao* (Illustrated Study of Ancient Jades). Laufer admired this study and used it as the springboard for his sinological analysis of jade. Laufer also examined and collected jades on his earliest visits to China while